清史研究的新苑

——第五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姜日天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第五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七朝古都河南开封召开。擦拨乃怀的汴城菊香迎来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 40 余篇。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实学研究会、开封大学、河南行政学院、中原宋学研究会联合主办。河南省委、省政府、开封市委、市政府，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给予了全力支持。

中国实学思想的终成期在明清两朝，鼎盛期则在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实学思想史的研究重要部分与清史研究同体重叠，同时二者又不完全重合，可谓关系密切。实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哲学、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艺术、道德在内的社会思想，以史为基础，在史中抽象概括，以理解历史之核。所以，中国实学特别是清代实学研究既与清史研究并行，又与清史研究交叉，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二者相辅以行。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国内论文 25 篇，其中有关清代实学研究论文 13 篇，超过了半数。另外外国专家、学者的论文，也有一部分涉及清史。东亚实学研究中的这个覆盖比率，值得清史学界关注。

本次研讨会有关清史的实学论文，大体可分为如下一些方面内容：

1. 自由经济思想。上海学者马涛在题为《论明清实学中的自由经济思想》的论文中，从“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经济主张、“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论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翻天覆地”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发生嬗变的历史过程。他指出：“在这个历史时期，经济上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政治上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学术思想上则出现了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在这一实学思潮中，还包括有自由经济思想。”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上述自由经济思想研究未足。马涛在论文的最后部分阐述了明清实学中的自由经济思想的积极意义，并与稍后时代欧洲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作了比较，分判异同，指出东西方相同的历史进路和不同的步伐样式。文章从自由经济思想论出发，论及“民富”与“国富”的关系，从经济进到政治构造，又从政治溯源“经济人假定”的人与物质、人的需要等有关人的本质理解层面的探讨，展开了较全面的历史思考。

2. 嘉、道、咸的考据与经世主张。本次研讨会述论清代考据与经世实学的论文有多篇，这些论文从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引起实学思想转向，分析当时的实学思想的政治倾向的流变情况。湖北学者周积明在《道咸经世派的纵横比较》一文中，比较了龚自珍、魏源、包世臣、陶澍、林则徐等的经世思想及其时代意义。他指出：“道咸间崛起的经世派，就其基本价值取向而言，皆以‘实言、实行’为重，但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个性品格，使他们在具体的文化行为乃至文化影响上，又表现出富有意味的差异。”作者比较他们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揭示出道咸实学重实行实言，走向近现代的历史新生面。黄长义在其论文《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中，论述了“汉学”衰变的历史过程，“宋学”的复兴和“汉宋之争”的情况和“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的清季实学。他说：“对于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原因，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倍受关注，且多有发明。但对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具体过程，却不够重视，缺少深入的研究。”该文正是考查了嘉道之际“汉学”、“宋学”、“今文经学”的变迁过程，揭示出嘉道学术由考据转向经世的总过程。从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到康乾的考据，再回归道咸的经世新风，清代实学经历了一个扭曲的路经，道咸经世学是实学的自我解放。可惜来得太晚，未足以应付西方炮舰的轰击。

3. 教育实学的新开拓。以往的实学研究关涉教育的论著所见嫌少，在本次研讨会上，北京学者李志军发表了题为《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的论文，给人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格致书院是 1873 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由华、英两国人联手创办的中西合璧的学校。中国实学走过清代“圆”形路程，外国的炮舰轰门为实学点了一串未完成的删节号。它的余蕴尤在，它要顽强的实现，因为它是文化传统，今天、明天亦如是。上海的格致书院是这个实现过程的一个缩影。李志军从书院的创办、性质、意义到实学教育的人才观、教育观、学术观，作了全面而翔实的分析、论述。作者高度评价了格致书院。指出：“格致书院这个西方科学之窗，是近代中国实学教育的典范。人才观是其办学的目标，

教育观是其办学的方法，学术观是其办学理论。三者环环相因，缺一不可，是一个有机的教育整体思想，连结三者的灵魂就是中国实学思想。”

4. 实学与宗教研究的新视角。关于实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实学界所论不多。北京学者张践的论文《康熙的实学思想和宗教政策》，具有开创意义。该文从康熙帝的实学思想、他的宗教观以及宗教管理政策等方面，纵论康熙帝“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与其批判宗教的思想及其宗教管理政策的关系。张践认为，康熙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他的文才武略推动了康乾盛世的出现。康熙皇帝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固然有社会历史的多方面原因，但是也与他对实学思想的学习、理解和应用密切相关。”

实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个重要题目。实学是我国乃至东亚古代 社会思想文化的总结，“实事求是”的实践理性是我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我国未如西方有漫长的宗教凌驾造极的历史过程，似也与实践文化精神 不无关系。康熙帝所为是这一文化精神的自觉不自觉的体现。因此，这一选题颇富启迪意义。

5. 区域一体研究的新突破。清代的对外关系远繁盛于此前其它朝代。借用域外文献资料研究清史，既提高史证水平，又增加了研究手段，扩大了研究“场”。要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不可忽略域内外互证的史学研究手段。在本次研讨会中，北京学者王政尧在题为《18 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的论文中，以 18 世纪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家朴趾源所著《热河日记》中有关清代诸多方面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确证当时的中朝关系、京、冀、热、辽地方的社会生活状况、当时京城里外士、农、工、商人等的思想、文化方方面面。作者强调指出：18 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的发展与清代中国有关“利用厚生”的先进科学技术密不可分。通过中、朝两国物质生活、思想观念的比较，亦见清代在东亚社会所处的地位和发展水平，形成了有参照系的研究，从而说明清史中的一些问题是区域性的，以此提供了一种开放的研究思路。他的研究不仅在选题和论述诸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同时在中韩实学交流史上也有了突破。

本届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东亚实学与 21 世纪”。根据中、日、韩三国实学会协商决议，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由三国轮流主持易地召开。会后新当选的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葛荣晋在题为《中国实学的回顾与前瞻》发言中指出：“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把实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为建构现代实学作出我们应有的历史贡献。”清史研究与实学研究关系密切，我们相信：在未来的 21 世纪，专家学者们将会对此有更加深入的研究。